

导论

邓小平理论：思想解放的伟大工具

20 世纪百年的历史即将写完。

新世纪的篇章就要展开……

1997 年 9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在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向出席十五大的 2000 多位代表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9 月 18 日，大会批准了这个报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迈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是中华民族再创辉煌的行动纲领。

十五大报告的内容全面而丰富，从回顾到前瞻，从路线到纲领，从经济、政治、文化到党的建设，从内政到外交，都做出了全面的论述和战略的部署。而贯穿这一切、统帅这一切的灵魂，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理解和切实运用。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对它的科学理解和切实运用意义就更加重大。因此，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学会运用这一思想解放的伟大认识工具。

一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

邓小平逝世以后，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到底举什么旗，走

什么路，国人在思考，世界在瞩目。

“马克思以后”“列宁以后”“毛泽东以后”都曾遇到过这类问题。就是说，在这些伟大理论创立者逝世以后，对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是坚持还是否定，是修正还是创新，是回归还是发展，存在着疑问，存在着斗争。毛泽东逝世以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历史地位，是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还是假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存在着“两个凡是”与“实践标准”的严重斗争。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锤定音，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事求是地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科学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理论体系，开启了一代新风。邓小平逝世以后，与毛泽东逝世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也不可回避地面对着“选择”的问题。可以说，国际、国内，党内、党外，人们都十分关注。“左”的影响和右的干扰同时存在，而“左”的影响则是主要危险。在这个关键时刻，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发表了重要讲话，作出了“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的科学论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这一牵动全局的指导思想、指导原则和至关重要的问题，写进了党的十五大报告，得到了大会的肯定和全党的拥护。

江泽民指出，十五大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旗帜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指导思想的问题；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就鲜明地举起了一面旗帜。在党的历史上，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具有划时代意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也具有划时代意义。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

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代表着我们党的方向，代表着我们党的形象。

旗帜就是方向。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是关系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为什么东欧剧变？为什么苏联解体？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却在风云变幻之中稳定发展？这个道理江泽民回答得好：“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因此，说旗帜是方向，是因为它是党的指导思想，是民族的精神支柱，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也是我们经受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的“主心骨”。正是因为我们有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世界大转折中，我们才既没有“荷戟彷徨”之忧，也没有“歧途亡羊”之虑；在国内转型时期，我们才既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又有理想追求和精神力量的驱动。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改弦更张，又有什么必要再回归“左”的那一套。党的十五大，把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作为主题，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这合乎党心，顺乎民意。

旗帜就是形象。如果说 19 世纪是中华民族衰落的世纪，20 世纪是中华民族奋起战斗、走向振兴的世纪的话，那么，中国应以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形象跨入 21 世纪呢？江泽民的回答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世纪的新的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因此，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就是我们的形象。说旗帜是形象，就是要在国际国内树立实事求是的形象、改革开放的形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形象。

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高举旗帜关键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全党努力造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求真务实的风气。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理论最富特色的内容，高举旗帜就要在国际上树立改革开放的形象，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打开国门而不可关闭国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根基所在，高举旗帜就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全面发展、全面进步。

总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是统一全党思想、振奋全民族精神的需要，是在国际社会树立我党改革开放形象的需要，是激励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

二 学风问题实质是世界观问题

怎样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江泽民强调，要倡导优良学风。而学风问题实质上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问题，也是世界观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思想，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但是思想一旦形成，就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就会形成按自己的固有规律发展的历史。每一代人所发现的真理，都会成为下一代人所继承的思想资料，并为其活动提供经验的或理论的指导。因此，就我们现代人的认识活动来说，无论认识什么事物，都不会像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认识活动那样从零开始。在我们的认识活动开始之前，头脑里总是预先存在了若干从前代人那里继承下来的范畴和知识，以及从自己以前的认识活动中积累起来的观念。既

定的知识和范畴越丰富，运用得越好，认识能力也就越强，认识活动的效率就越高。所以，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但这种既定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又往往与当前的认识对象发生矛盾。于是，要正确地反映当前的客观事物，既要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又必须正确处理头脑里的现成知识、范畴同当前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事实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自己已有的知识的作用，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这两条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对人类既定的知识形态和客观实际的态度问题，亦即对主观和客观的相互关系的态度问题，也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态度问题，因而是一个世界观问题。

当然，说学风问题是个世界观问题，并不是直接在二者之间划等号。学风和世界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又是有区别的。哲学世界观从本来意义上说，是指怎样处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学风则指的是人们的世界观对待既定知识的态度，在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上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表现。因此，哲学上的唯心论者，可能在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上有某些值得称道之处，信奉唯物主义的人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错误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这都是学风对世界观的不自觉的游离。但无论如何，树立实事求是的学风，应当是一个自觉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基本要求。

从本来意义上讲，学风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反对经验主义，一个是反对教条主义。不过，从中国文化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来看，认真学习前人的思想成果，特别是学习先进的思想成果或者势力强大的传统思想观念，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一般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难的是打破因袭习惯，打破教条主义，根据客观实际活用原则创造新的思想成果。

两千多年儒家思想的统治，培养了一种习惯性的因袭性格和懒惰习惯。

马克思列宁主义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也遇到了类似的思想氛围。一方面，中国人民是在如饥似渴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屡不逮志的情况下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唱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凯歌来到中国的。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马列主义一来到中国，就取得了较高的威信。走俄国人的路！随着这迫切的呼声，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且，她一诞生，就立即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但是，这一切来得是这样突然！从十月革命到 1921 年，只不过 4 年的时间。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历史还很短暂，感性的经验并不丰富。中国人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消化和掌握并不充分。这样，一方面，党内不可能有人敢于像德国的拉萨尔、杜林那样，公开打出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也不可能有人敢于像伯恩斯坦和波格丹诺夫那样，公开提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另一方面，从来没有得到过彻底清算的因袭性格却继续在发挥着作用，只不过是从盲目崇拜传统文化或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又转向了盲目崇拜马克思和列宁的某些论断。虽然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对这种真理或对其某些具体结论盲目崇拜，而不是当作研究实际问题的指南，却远离了马列主义本身的原则。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使我们看到，在中国共产党内，学风问题的确是个世界观问题，是世界观的重要表现。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了根本。同时一定要以当代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

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里提出了三个“着眼于”，对理论的运用也好，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也好，面对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也好，都必须以实际问题为中心。这种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学风，也就是实事求是的学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丢，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也有个怎样对待“老祖宗”的问题，即使是邓小平理论，也要在实际运用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然而，有人认为，资本剥削、股票投机，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已成定论，社会主义不能用；有人搬弄马列关于公有制论述的只言片语，认为邓小平理论违背了马列主义，是在搞私有化；有人囿于自己的片面实践，强调还是经验管用，否认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这些错误倾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僵化了，不是作为行动的指南，而是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这无疑于断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机，也堵塞了理论的来源和动力。因此，掌握和运用邓小平理论，决不能犯这种“僵化”的错误，而要以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面对大量的实践经验，只有运用思维的力量、理论思考的作用，才能完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从而提出新的观点、得出新的概括、创造新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再进入理论到实践的新的飞跃之中去。譬如：我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1978年割破手指在“大包干”的责任书上摁了血手印，当年即战胜秋旱夺得创纪录丰收。就在安徽人民惴惴不安、大包干在全国推行遇到重重阻力的时候，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支持，并对“大包干”经验进行了理论思考，概括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指导全国的农村改革。再譬如：引进外资发展“混合经济”，发展以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股份合作制”，搞好国有企业要“抓大放小”，等等，这里的“混合经济”、“股份合作制”、“抓大放小”，都是新的概念，没有对实际问题 and 实践过程的理论思考，是提不出来的。

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就是说，在开创新事业的过程中，只能按照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大胆实践，大胆探索。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严格地以事实作为自己的依据。当你遇到一个新鲜事物时，你对有一种人讲这个新鲜事物，你的问题还没有讲完，他的问题已经提了一大堆，无非是不理解，有许多解释不了的逻辑，有许多与已有学说相悖的观念。这时你没有必要再解释、再争论，让事实来回答，由实践来检验。事实和实践将作出最好的结论。譬如现在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有人就提出了姓“公”还是姓“私”的问题。其实，这是“左”的思想束缚的结果，我们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上自己禁锢了自己，以为国有企业一合资，一实行股份制，企业的性质就不姓“公”了。然而，我们许多合资、股份制企业，都有国有资产在其中，而且大部分还在其中控股，通过新的实现形式使公有资产扩大了。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这是对邓小平改革理论的深化，使我们许多认识上的难题得以化解。当前要按照邓小平理论大胆实践，主要就表现在破解各种难题上。我们只要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新的经验，用新的概括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总之，学风问题实质是世界观问题。倡导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要把三个“着眼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缺少哪个

“着眼于”都不行，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不是真正的高举旗帜。

三 学会运用思想解放的伟大工具

列宁曾把无产阶级的宇宙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伟大的认识工具”^①。然而，对于认识的工具正像其他任何工具一样，有会用的，也有不会用的。

实践证明，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人，或者根本没有掌握马列主义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或者不会使用这个工具。因此，中国革命成败的分野，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说，就在于是否善于运用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毛泽东却善于运用思想解放的伟大认识工具。他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现在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趋势，取得了思想解放的巨大成果：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扭转了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学风，开创了注重研究中国国情、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并且把它总结为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一切胜利都得益于这一优良传统和思想路线。

邓小平之所以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能洞若观火，与他长期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是分不开的，他有着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他说：“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②而有的人则主张凡是毛泽东圈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1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5页。

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而且还美其名曰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其实，这不是真高举，而是假高举，因为他们不懂得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样一个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毛泽东的思想解放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著名的《实践论》阐述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客观事实告诉我们，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是不易统一的，要使主观的辩证法和客观的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乃是“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的事，不可能一学即会。不是这里会了，那里会了，就可万世千秋。这就有个思想解放无止境的问题。那么，人们在这诸多矛盾面前是否无能为力呢？不是！人的实践就是发现矛盾和解决矛盾的金钥匙。所以，毛泽东把实践称为沟通主观和客观的桥梁，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指出，实践把精神转化为物质，使有根据的可能成为现实，具有直接现实性；实践又把物质转化为精神，是认识发展的源泉，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的目的，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实践，始终是社会的实践、历史的实践、群众的实践。因而，一个好的领导，一个臻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解放中始终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邓小平发挥了毛泽东的思想解放论。在他看来，解放思想的涵义就是开动脑筋、就是实事求是、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思想的内容就是走出封闭、就是破除迷信、就是转换脑筋；解放思想的形式就是在百家争鸣中解放思想、在打破僵化中解放思想、在阐发传统中解放思想、在自我完善中解放思想，要倡导科学和民主精神；解放思想的方法就是多样化的方法和科学化的

方法。社会变革是以观念变革为先导的。革命如此，改革也是如此。观念变革、思想解放成为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总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

本书试图把毛泽东、邓小平思想解放论的伟大认识工具提供给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人民，试图把解放思想作为哲学的主题。它与实事求是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和未来中国哲学的主体内容。

本书在内容上由两大块构成。一是解放思想研究（见第二至第六章）；二是观念变革研究（见第七至第十一章）。两者虽是有机的整体，但侧重点不同。因此，对于本书的副标题决不可忽视，以免在阅读时带来不便。

本书的导论部分从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到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入手，揭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第一章是历史的回顾。从林则徐“睁开眼睛看世界”始到邓小平理论以“南方谈话”为标志走向成熟止，在较长的历史跨度内，描述了中国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始终把解放思想作为主题。每当社会发展到了即将发生激烈变革的关键时刻，思想解放就成了社会政治革命的先导。第二章到第六章是解放思想研究。阐述了思想解放的涵义、思想解放的原则、思想解放的要求、思想解放的形式、思想解放的方法，其内容实质上就是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解放论。譬如思想解放的实事求是原则，这既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 页。

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思想解放必须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又要求解放思想。实践反馈原则，实际上是毛泽东《实践论》的观点、现代信息反馈原理和邓小平相关论述的有机结合；破旧立新原则，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矛盾论》中新陈代谢规律的阐发。而思想解放要求中的走出封闭、破除迷信、转换脑筋等内容也是对邓小平思想解放论的阐述。第七章到第十一章是观念变革研究。展示了从改革心理到思维方式再到观念形态的逻辑秩序，并且对观念惰性的主要范畴——习惯、偏见、宗教，观念变革中的“哲学革命是政治变革的前导”的原理、观念变革的渐进与革命辩证统一的原理、观念变革的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原理，等等，都分别作了论述，这里吸收了世界上一些思想家的优秀成果，对现代科学的事实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作了一些理论概括，其中也含纳了个人的一些新思考，然而却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变革论作为主线。结束语从展望 21 世纪的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风貌，思想解放论的研究到底将在哪些方面深化入手，揭示了解放思想将是 21 世纪的最强音。新世纪需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拥抱新世纪。解放思想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

总之，哲学——真正的哲学——必是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伟大工具。

第一章

中国走向现代的思想解放运动

回顾 19、20 世纪的中国，是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中国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每当社会发展到了即将发生激烈变革的关键时刻，思想解放的先驱们，总是以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冲破旧思想的牢笼，开启新思想的闸门，创造出崭新的时代风貌。

第 一 节

以开眼看世界为特征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严格的自我封闭的社会，除了邻近几个国家以外，不与外国交往。清代统治者以“天朝”自居，对西方的先进事物投以不屑一顾的鄙夷眼光。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军舰长驱直入，用重炮猛轰沿海的许多重要城市，中国的万里长城终于被打破，再也无法闭关自守下去了。

一 林则徐：“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

以林则徐为开端，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活动。如果说林则徐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

人”，那么，大体上从洋务运动时期以后，除了极端顽固分子仍然坚持把“西学”视为“奇技淫巧”，一般说来，社会思想已经显露出解放的势头，向西方学习，这时几乎成为时尚。

林则徐在抗英斗争中，看到了外国武器、技术的先进，产生了解外国，汲取外国技术长处的想法。他特别重视学习、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和装备。他反对非法的鸦片贸易，但并不反对合法的贸易往来；他反对慑服于侵略者的“船坚炮利”，但并不反对购买外国的船炮以求自己的“器良精熟”。

林则徐在广州任内，派人编译外文书报，辑成《四洲志》，介绍了 30 余国的历史、地理。根据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撰成《海国图志》50 卷（以后增补为 100 卷），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该书刊行后，“风行海内”^①，起到了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启蒙作用。

林则徐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思想主张在客观上使人们打开了眼界，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相对优越性，看到了经过工业革命，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有了极大的发展。这有利于人们思想的解放，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瓦解。

二 谭嗣同：戊戌变法时期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

“冲决一切封建网罗”，这是谭嗣同阐述的在当时来说最激进的观点。他激烈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号召打倒纲常名教，冲决一切封建网罗。他吸取和运用西方近代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以及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并以这些东西为武器，深刻揭露了封

^① 薛福成：《庸盦笔记》。

建君主制的暴虐，鞭撻纲常名教锢杀人们灵魂的伪善，从正面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民主的思想。

毛泽东曾经正确地指出：在封建主义制度下，神权、君权、族权和夫权，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①这四大绳索长期地禁锢着人们的政治、思想及人身的自由，摧残着人们的身心。谭嗣同在清朝廷高压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箝制下，敢于奋不顾身地大声疾呼冲决包括四大绳索在内的“一切”封建网罗，是很了不起的行动。他在其代表作《仁学》中指出：“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②总而言之，君主专制、宗法制度、封建礼教、宗教迷信、腐朽的文化、旧的社会习俗，等等，都在“冲决”之列。可以认为，谭嗣同的这种思想，是十分接近于资产阶级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的。其中心是要求打破束缚资产阶级新兴政治力量、社会势力的封建桎梏。他的思想在同时代人中，表现了最激进的态势，不仅在当时闪现了璀璨的光辉，而且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出了有力的先声。邹容、陈天华、吴稚晖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宣传家，都受到谭嗣同反封建政治倾向和思想的深刻影响。

①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第 31 页。

② 《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下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456 页。

三 胡适：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

真正破除“旧学”，创立“新学”的是胡适。他以“文学革命”和“全盘西化”而在中国学界与文坛声名鹊起。这与他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和批判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

胡适最大的贡献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白话文，发起文学革命，使白话、语体文成为学术上政治上文章的主要形式，其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在介绍西学方面，并没有做多少工作，主要精力放在“整理国故”方面了。但他实际上是“全盘西化”论的领袖。他再三宣称“中国百事不如人”，甚至说过“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虽然是激愤之词，并不表示他愿意当亡国奴，却是他全盘西化思想的宣泄。1935年6月22日，他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指出：1929年，我提出的“全盘西化”的“全盘”这个词容易引起争论，当时潘光旦就予以指出了，但其涵义却是明确的，即“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

胡适一方面高举“充分西化”的大旗，另一方面又挥舞着“批判传统文化”的利剑。胡适受过系统的西方文化的熏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深厚的功底。因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更能切中要害。而且，他有着其他新文化运动领袖所不及的思维方式与语言魅力，所以其文化主张更具鼓动性，更能为广大青年所接受。请看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

（对传统文化）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

今日还是不错吗？”

(3) 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大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更好，更有理，更有益了吗？”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

这平易的语言表面看起来，好像缺乏火力，但对于启发青年对旧文化的叛离，却比那暴风骤雨般的文字更有驱动力。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这里借用了尼采的一句话“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尼采是 19 世纪末一位非理性主义哲学家，“用铁锤作哲学思考”，以反传统的学说而震动西方文化界。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胡适显然深受尼采的影响，并以尼采反传统的叛逆精神来重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通过调和中西两种文化就能解决的，“调和是人类懒病的天然趋势”；中国的前途只有破旧立新，通过对旧文化的彻底批判，才可能以健全之心身接纳西方文明。^①

^① 参见启良著：《新儒学批判》，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17～18 页。